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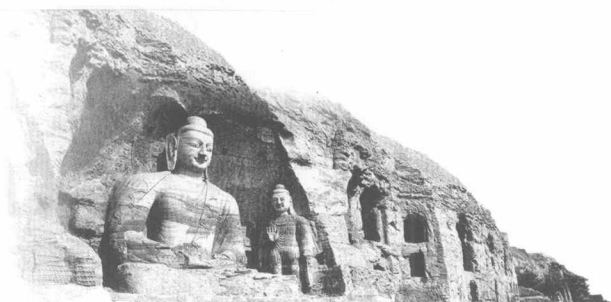
周一良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周一良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 周一良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7

ISBN 978 - 7 - 101 - 07421 - 5

I. 魏… II. 周… III. 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
时代—文集 IV. 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93927 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著 者 周一良

责任编辑 李洪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21 - 5

定 价 29.00 元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代前言)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榦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

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

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煊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陞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八十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

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了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讎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

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 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蜚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

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羨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

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1999年5月7日记。

(原载《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目 录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代前言)/1

第一讲 论诸葛亮

附:白羽扇/14

第二讲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附:白羽扇/14

第三讲 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附:白羽扇/14

第四讲 两晋南朝的清议

附:白羽扇/14

第五讲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62

第六讲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附:白羽扇/14

——89—116

第七讲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附：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115

——117—138

第八讲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139—152

第九讲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153—168

第十讲 论宇文周之种族

——169—202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附一：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185

附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194

——203—211

第十二讲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

1. 曹操遗物/205
2. 鲑/206
3. 晚有子/207
4. 乐舞杂伎/209
5. 珠襦玉匣及其他/212

附录一 学术自述/215

附录二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224

出版后记/230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第一讲】

论诸葛亮



三国 蜀 持箴箕陶俑



诸葛亮像

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①。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

^① 184年凉州黄巾攻入四川，见《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

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①。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②，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

① 《蜀志》卷十《李严传》注引亮答严书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这是诸葛亮自己谦逊的话。是指他的才能而言，不是指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地位。例如姜维是个“布衣”，而《蜀志》十四本传载诸葛亮的话称他为“凉州上士”，也与经济上或社会上地位无关。

② 据《蜀志》卷五亮传注引《献帝春秋》，其中所记诸葛玄事迹和陈寿所记有出入。

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莱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

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①，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②。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金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

①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人事部》一百鉴戒条诸葛亮诫子语。

② 《蜀志》卷二《先主传》注引敕后主诏及罗泌《路史》注。